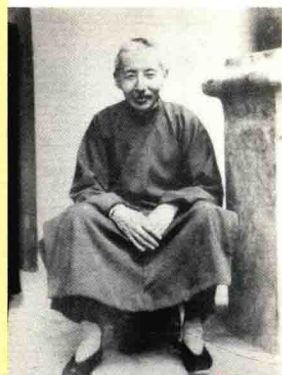




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报界宗师

張季鸞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报界宗师

張季鸞

刘宪阁 山石 王敏芝 编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ZH15N115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界宗师张季鸾 / 刘宪阁, 山石, 王敏芝编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5. 12
ISBN 978-7-5613-8324-7

I. ①报… II. ①刘… ②山… ③王… III. ①张季鸾
(1888~1941)—传记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1520 号

报界宗师张季鸾

BAOJIE ZONGSHI ZHANGJILUAN

刘宪阁 山石 王敏芝 编著

责任编辑 / 张建明 李眉

责任校对 / 杜世雄

封面设计 / 鼎新设计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4.5

字 数 / 224 千

版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8324-7

定 价 / 36.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社高教出版分社联系。

电话:(029)85303622(传真) 85307864

前言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享有国际声誉的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和报纸评论家。幼时,他就读于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因文章出众而深得沈卫、沈钧儒等名人的赏识和器重。1905年,张季鸾官费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课余主编倡导革命的《夏声》杂志。1911年回国,任上海《民立报》记者。辛亥革命后,张季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916年至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主要负责评论工作。在此后的15年间,他始终坚持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紧扣读者心声,使《大公报》发行量跃居当时中国报业发行量的榜首。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获当时国际新闻界极富声誉的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奖。张季鸾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后,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不党”,就是报纸不属于任何党,原则上“等视各党,纯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不卖”,就是“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不以言论做交易”;“不私”,就是“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他的“四不”主义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行动以使天下公众监督。

在办报过程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1930年春,蒋介石连续三次围剿红军,《大公报》追踪报道,发表了大量赞扬和

肯定红军的文章,为正义力量的壮大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段时期,国民党要求各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过这个命令;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发表了范长江在延安采访时撰写的文章,及时报道了陕北的真相;《大公报》还派记者曹谷冰去苏联采访,连续报道苏联的建设成就,鼓舞了革命者的士气,坚定了广大群众的信念。

《大公报》具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文人论政”。张季鸾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所谓“文人论政”,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

为了国家,为了公义,张季鸾曾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为“三骂”的社评。

一是1926年12月4日的《跌霸》。该文中说:“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这是骂吴佩孚;二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文中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之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三是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文章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浩叹“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坚定立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纯拙之笔,写尖锐之文”。他的政论,不偏激狭隘,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

故而报界同人称赞曰:“近代文人论政,前有梁启超,后有张季鸾。”他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活的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张季鸾的才华被国民政府看中,欲以金钱收买。

1932年5月,在一次国民党中常委秘密小组会议上,经宣传部长叶楚伦策划,决定以15万元(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700万元)收买张季鸾及其《大公报》。张季鸾在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的15万元交通银行即期汇票时,立即召集编辑部人员,在发表了“文人要穷,文穷而后工”“文人就是不能发财,否则文章就写不出来”“《大公报》要坚持十二字办报方针”等言论之后,命总务主任将汇票退回。

因为针砭时事、敢说敢言,张季鸾曾两度被捕入狱。

1913年,袁世凯秘密向英、美等四国大量借款,伺机向南方用兵,镇压民主革命,并一手策划了“刺杀宋教仁”一案。张季鸾闻讯,愤然挺身秉笔,在京、沪《民立报》上揭露真相,遂被袁世凯拘捕入狱。经过社会各界出面营救,他才脱险。

1917年,张季鸾因披露段祺瑞卖国行径而再度身陷囹圄,历时半年之久。出狱后,他撰写发表了《铁窗百日记》长文,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赞颂。

对此,于右任评价说:“恬淡文人,穷光记者,不避艰难,说袁家黑狱辛酸呕出心肝。”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每天一篇3000字的“社论”,均由张季鸾执笔。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病在重庆逝世,国共两党均发唁电,以示哀悼。

毛泽东等人的唁电是:“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

蒋介石的唁电是:“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軀。握手犹温,遽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怆悼之怀,匪可言罄。”

两党最高领导人对张季鸾同时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实属罕见。因为张季鸾未任政府公职,不便国葬,于是以国葬待遇举行了“公葬”。其葬礼规模空前,为新闻人葬礼之最。

1944年,大公报馆出版了张季鸾先生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于右任题写了书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为其作序。他在序中说:“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今日重提季鸾先生,重新去认识张季鸾,重新解读张季鸾,意在传播、弘扬其精神和品格。

张季鸾以一介无拳无勇的书生，怀抱文人议政的理想，虽两度系狱，而志气未尝少歇，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节操。他的社论更是使《大公报》大放异彩的金字招牌，于新闻中见评论，在评论中有新闻，笔锋常带感情，功效辟易千军。对此，书中都有浓墨重彩的铺陈。同时，书中还穿插了不少文坛掌故、报界秘密，足广见闻。周恩来曾经说过，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此语正如“文坛巨擘，报界宗师”之悼词一样，实在可以生为考语，死做墓铭。

本书吸纳了同名纪录片拍摄过程中采访张季鸾同事、亲友的后人的实录整理素材，许多资料属首次披露，真实、可信，是对以往张季鸾研究成果的丰富。

目 录

第一章 辗转求学 助力革命	001
一、榆林张季子	001
二、师从刘古愚	005
三、东渡扶桑,属意革命	011
四、孙中山大总统秘书	025
第二章 抽身政坛 重返报界	027
一、人生的低谷	028
二、投身报业的反袁勇士	028
三、两度系狱	036
四、互为伯仲	042
五、张季鸾的办报特点	049
第三章 珠联璧合 文人报国	059
一、主持笔政	059
二、书生报国	061
三、张季鸾的政论写作	065
四、张季鸾著名的“三骂”	066
五、张季鸾社评的选题范围及政治态度	076
六、张季鸾的政论特色	083
第四章 桑梓情深 故园难忘	090
一、桑梓情深	090
二、赈灾募捐	092

三、乐善好施	093
四、亲恩难报	093
第五章 为报国恩 一心抗日	097
一、抗战全面爆发	097
二、张季鸾与蒋介石的恩怨	098
三、“九一八”前后的张季鸾与《大公报》	108
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张季鸾	118
五、保卫邦家,应付外侮	121
第六章 知人善用 明察秋毫	125
一、名士风度,菩萨心肠	126
二、桃李满天下	130
三、张季鸾与徐铸成	143
四、腾龙跃虎,游刃有余	148
第七章 大家气度 国士精神	151
一、首倡“四不”办报方针	152
二、新记大公报的三驾马车	156
三、西安事变中的张季鸾与《大公报》	163
四、张季鸾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过程	173
第八章 报人楷模 鞠躬尽瘁	194
一、报人楷模	196
二、荣获“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	200
三、鞠躬尽瘁,巨星陨落	202
四、报界宗师:对张季鸾精神及价值的再认识	204
附录 张季鸾成就	220

第一章

辗转求学 助力革命

一、榆林张季子

张炽章，字季鸾，后以字行。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3岁时，少年张季鸾不幸丧父。历尽千辛万苦，与母亲扶柩回到榆林。先后在榆阳书院、宏道学堂就学，历受名师指导点拨，成绩优异，打下比较扎实的古文和史地基础。1904年到省会西安应试，深受学台（教育厅长）沈卫器重，并与其侄沈钧儒及于右任等订交。若干年后，张、沈、于等都成为民国名人。

1. 武人的家庭背景

榆林，作为重要的边塞要地，很多人都是以当兵戍边为主。张家从陕北的米脂开始，移民到榆林也有若干代人。从明朝起，有好几代人开始当兵，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张季鸾的父亲张楚林，就是后来的楚林公。他本来也是有志于当兵吃军粮的，但是，他参加武考的时候，出了点儿纰漏。要射三箭，头两箭都很成功，第三箭是骑射，结果从马背上摔下来，导致失利。武考上没取得什么进展，也不可能当兵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被迫转而开始读书。不过，这个转



型非常成功。一个武人家庭背景出身的人,居然有幸成为乾隆以来陕北地区的第一位进士。这大概是光绪三年(1877)时候的事情。



与亲人合影(右一张季鸾、右四张季珍)

这样一种武人出身的家庭背景,使张季鸾先生爱好谈军事,也被人称为现代中国三个知兵的文人之一(另外两个是丁文江和傅斯年)。我们看到他的交往圈子中,有很多老一辈的军事将领,像蒋百里这样的人,也有西南云贵地区的军事元老如李根源,还有年轻的像胡宗南,以及陕西走出的关麟征这样的年轻人。

张季鸾也关心军事技术和国防进展。他去日本留学的时候,首先留意到了日俄海战大的背景,他对现代海军的重视,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翻译出版了一本谈海战的书。当时,张先生特别作序推荐这本书。这和九一八事变后所谓的明耻教战,尤其是教战部分联系在一起的。

从这样一个家世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张先生不是一个文人,他还有着一腔关心国事、主张以现代的军事国防手段保家卫国的爱国热忱。

2. 父亲为官

张父张楚林,少年时期蒙受总兵刘厚基、知府蔡北槐赏识,弃武从文,考中进士,以知县分发山东。

张季鸾父亲在山东做了几任小官,但是,都不太成功。按照章太炎所撰的墓碑,里面说他善于断狱判案。不过,从已经公布的史料来看,这些说法可能都不太准确,可能是为尊者讳而做的一种姿态。一些资料表明,张先生的官当得并不成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前期生了几个孩子,这一点从名字里面可以看出端倪。比如,张季鸾叫季鸾,古人行辈按伯仲叔季排序,所以张季鸾有三个哥哥,另外有两个妹妹。这几个哥哥在他父亲去世后不久,都因为各种缘故离世了。

1934年,张季鸾回乡祭祖,当时正值他的父亲百年冥诞,这个时候,他的几个哥哥都离世了,一个妹妹也离世了,只剩一个小妹妹,即张季珍女士,后来嫁给李仪祉,就是关中蒲城李家众兄弟之一。张季鸾的这几个兄弟都没了以后,也都没有留下任何的子侄辈。张先生有很明显的家族血脉的焦虑,这也导致了他在婚姻生活和其他方面会有一些特别的表现,最典型的是,为了寻求香火延续而不断续娶的问题。

张季鸾父亲人称老进士。考中的时候四十多岁了,这也不奇怪。在过去的科举体制里面,念书准备,从秀才一直慢慢考,从乡试、会试慢慢考上来,四五十岁考中进士是很正常的。当然,这种老进士跟他一直是武人的家庭背景也有关联。张楚林做官很不得志。比较耿直,在官场上不搞行贿,不搞关系,同事上下级之间看不上他,不断排挤他。但是,山东当时也有一任官员赏识和提拔他。

张楚林虽然是念书的,然而,他时刻关心着军事和当地的安危。当时,清末有一次著名的回民起义,已经攻打到榆林城,他协同当时的总兵刘厚基等击退了这次进攻,保卫了榆林城。

张楚林协助榆林城的守兵抵御了外敌,刘厚基才发现这个读书人不简单,居然还可以治兵守城,就开始慢慢提携张楚林,让他有机会从一个当兵的世家



转成读书人。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张曜,也帮助了张楚林。张曜也是当兵出身,很看得起这种本身读书却也可以治兵的人物,这也导致了张季鸾的父亲在官场上连续多次被贬的情况下,仍得以在山东做了长达5年的县令。楚林公在山东做的几任官都不长,都没超过三四年以上的,只有在邹平这个地方当的时间最长。

3. 家族重教

张季鸾出生时,他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可能会指点他小时候读一些书。但是他的教育,更多的是回到陕北以后形成的。毕竟他在山东那几年,也就十二三岁以前,他没有读过太多的国学类书籍。倒是回到榆林以后,先是在榆林的大儒田善堂先生那里受到指点和教导;然后又有在当地做官的、像陈璜这样的士大夫提携他,让他有机会去读更多的书,并知道怎样读书。何况,他在山东时,父亲在外面做官,也没有办法照顾家里。他自己和母亲生活在家,这样的分居生活,就很难指点他。回到陕北以后,才有比较完整地接受教育和指导的机会。

特别是陈璜推荐张季鸾和自己的儿子到省城附近,到刘古愚先生这里接受关中的教育,成为张季鸾真正接受完整教育的开端。

张季鸾母亲王氏是当地一个小财主的女儿,家世不好也不差。她续弦嫁给季鸾父亲时也就十几岁,1904年去世的时候才三十出头。这位母亲带有山东孔孟之乡的精神特质,特别关心季鸾的教育。回到陕北以后也特别支持张季鸾的学习。但是,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张楚林虽然是在山东做官,但是在陕北老家,还是有些多年积攒下来的产业。但由于他1877年考中后,多年在外做官,到1901年前后他离世时,离家已经二十多年了。家里面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回来料理家事,也发生过一些纠纷。从章太炎先生为他所撰墓志中留下的记载得知,张楚林在陕北唯一的一份产业被合伙人欺负孤儿寡母剥夺了。这就导致张家相对比较贫寒。虽然如此,但是王夫人对张季鸾的教育仍然非常重视。当时张季鸾还小,对母亲也曾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家境这么困难,是不是不读书了,我

们再想其他的解决办法。然而,他母亲仍然很坚强:就算我们只有这样一点儿钱或者几个元宝的情况下,还要坚持去念书。

后来张季鸾跟着田善堂读书,还跟着陈璜的儿子伴读。张季鸾能够读书,也是得益于族里、乡里的帮助了。张家在当地人丁确实单薄,如果家族强盛,有族学有私塾的话,肯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他们家族人丁明显地不甚兴旺。所幸的是,当地一个念书出身的父母官发现有这样一个读书的苗子,他认为季鸾比较聪明,文章才思敏捷,出于中国传统的扶持弱者、帮助乡里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并提携张季鸾。

二、师从刘古愚

1. 晚清关中的大儒

刘古愚,咸阳人,北宋经学大师张载的近代传人,中国近代最后一位关学大儒,是资产阶级戊戌变法运动在陕西的重要启蒙人物。戊戌变法期间,他坐镇西北与康有为遥相呼应,故有“南康北刘”之谓;变法失败后,为给“后起者留下取法之资”,他在昭陵附近的九嵎山下结庐建屋,开办烟霞草堂,含辛茹苦,志在播火。

多年以后,同门师兄于右任说,张季鸾深厚的国学功底,以及社评文章的警策绵密,最早应得益于古愚先生的教诲。而事实上,恩师正直、狂放的人格,以及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更是早在少年时



刘古愚



代便已镌刻在张季鸾的骨血里。

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刘古愚是一个大儒，但是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只会死读书的大儒。他已经跟当时比较新的一些思潮，典型的像严复他们这些人所主张的那种维新变革很亲近，康有为、梁启超的书他也会读会看。他是陕西地区较早提倡维新变革的人。他认为，不能仅仅是读书做文章这种学问，而且要有经世之学。他也是按照这方面的要求来培养他的学生的。让学生关注生活中的学问、经济中的学问。他教导的是这种观念。张季鸾先生后来开始学现在通常讲的政治经济学，并对这一类的东西感兴趣，也跟刘古愚先生的影响有关系。关于这方面，刘先生有很多表述，是明显影响到张季鸾后来求学取向的。

对明末讲求实学的顾炎武、李二曲这两位大儒，刘古愚印象很深，特别喜欢谈这两个人。每当说到明末南渡的那些人，就是跟着南明小朝廷跑了，去当官了，对那些人，刘古愚就非常不满，常常斥他们误国，认为那些人是不利于国家的人物。而对这那死于抵抗清兵的贤者们，他常常是咏叹不已。

对清代的人物，刘古愚特别推重的就是湘军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胡林翼。这对张季鸾也有影响。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季鸾他们说，对日本只有一个策略：扎硬寨，打死仗。熟悉曾、胡治兵语录的话，就会知道，这是曾国藩和胡林翼他们治兵的一套格言，是从那里演化出来的，这一点影响应该也是来自古愚先生。

对于戊戌变法期间死难的六君子等，刘古愚也是特别有感情的；而论到国家的政治形式，刘古愚也是特别注重外患而轻政体。所谓重外患而轻政体，意思就是说，他更注重在世界的大背景下看中国的外部敌人，而对于这个国家采取什么政治体制，到底是皇帝制、君主立宪制，还是明显的宪政体制，刘古愚认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谈到帝制与共和到底哪个优劣的选择，但是，在批阅张季鸾阅读明鉴的笔记的时候，刘古愚明确说过一段话，大致谓选君终身制，以济世袭之穷……就是说，可以实行皇帝体制，但是得选出明君来，这样可以避免世袭的那些弊病。同时，他也深感国家（保国保教）的这种艰难，所以更认为当

下患在于弱,而不在满洲,不在于清朝人统治,不管换谁上去,哪个民族都一样。

关于西北问题,刘古愚主张融合汉、满、回、藏等各个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族和回族,同时教化。多年以后,张季鸾对此印象深刻,并由衷感叹,说古愚先生的民族主义,是所言者大矣,所见者大矣,这种以国家利益或者以民族大义为本位的重外患、轻政体的看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张季鸾后来在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对日问题上的一系列看法,这些都跟古愚先生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刘古愚还和学生们一起讨论过开私塾、义塾,开设白腊局、轧花厂等一系列的问题。他认为,书生的通弊在于以技艺视学问,那样的话,即便博览群书,你也不过是个技艺之师。刘古愚认为,真正求学的大旨应该是救世以外无学问,致用之外无经术。就是所有的学问和经术,都应该有救世致用的这样一个功能,今天看起来,这些虽然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多年以后,张季鸾仍然发现,刘古愚的这些看法已经被证明为治国真理。

比如说,民国以来的教育,只是使那些富家子弟越发浮夸,虽然口口声声说是民为邦本,但实际上却将民众弃之化外,根本没有体现出民为邦本、以人为本的这样一种倾向。那么,所谓的重农之说、劳工之论,又从何谈起呢?那时候,大肆宣传、最爱说这些东西的人,据张季鸾观察,大部分都是好逸恶劳之辈。

有件事情对刘古愚刺激比较大。19世纪90年代是中国近代的转型期,特别是1894年的时候,中国这样一个堂堂大国竟然败给一个小国日本。刘古愚当时一直在反思,为什么一个大会败给一个小国。他想来想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国民教育不发达,知识不发达。

刘古愚认为,过去传统的教育只有士人才有教育,这才叫学问,其他的像农工商这种低贱的东西不属于学问之列。从日本的经验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刘古愚认为,这种东西也可以成为一种学问,也是应该被掌握的。过去只强调少数精英的教育,而忽视普通农工商、士兵的教育,是不合适的。刘古愚认为,普通人都应该接受教育,而且是接受更高的一种普及性的教育,以及技术的提高。这也是刘古愚先生和陕西关中张载先生开创的陕西学派“为万世开太平,



为往圣继绝学”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 刘古愚：康梁乃吾党也

刘古愚到底是什么党？当时刘古愚所在的陕西还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还不太接受外界的思潮，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那种维新思潮。因此，当有人认为他为康梁一派的，甚至直接把他叫康党时，刘古愚表示出极大地不认同：你们都把我看作是康梁党，实则是康梁是我这一党。原文就是，世俗目我为康梁党，实则康梁乃吾党尔。意为与其说我是康有为他们那一党的，还不如说康有为是属于我这一党的。刘古愚的这种党派立场，张季鸾也是颇为肯定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立场，使他在党派问题上有一个更超然的看法，不会局限于这一派那一党，而更加把国家和民族的东西放在更高的位置上。

3. 不能仅仅学六艺、学做文章

张季鸾最初去找刘古愚的时候，要学六艺之学，学做文章。刘古愚却告诉张季鸾他找错了人。因为，刘古愚认为，仅仅学六艺之文、学做文章对国家益处不大，不是他希望所弘扬的教育。实际上，刘古愚先生本身也是很擅长做文章的一个人，只不过，他嘲笑自己做的是八股文，刘古愚的学问、文章很不错，他虽然不重文章不识章句，但是，他所有的文章境气却很有气势。特别是1898年百日维新以后，他主办著名的关中书院，在那时候就开始提倡经世之用之学，就是鄙视、看不起八股文。所以，他跟张季鸾说，你来错了，你找我学做文章的话，肯定不对。并不是说，张季鸾真的来错了，或者不收张季鸾这样一个学生。他只是告诫张季鸾，你求学，不能来学八股之文，要学经世之用之学，毕竟先生之学无所不能，那么，张季鸾认为，他是个无所不通的这样一个人，而治经学几个字尤其直透经纬，实高意远。所以，刘古愚虽然没有教他怎么做文章，但是在读史学方面的训练，让张季鸾终生受益匪浅。这种对学问的认识对张季鸾日后的学习与人生选择都有很大的影响。

刘古愚对“民族大义”的理解，对张季鸾也影响很深。